



当代哲学经典

*The Classic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哲学卷 下

俞吾金 吴晓明 杨 耕 丛书主编

杨 耕 吴晓明 仰海峰 分册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哲学经典

*The Classic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哲学卷 下

俞吾金 吴晓明 杨 耕 丛书主编

杨 耕 吴晓明 仰海峰 分册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全二册)/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丛书主编;杨耕,吴晓明,仰海峰分册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3-17312-9

I. ①当… II. ①俞…②吴…③杨…④仰… III. ①现代哲学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①B15 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526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DANGDAI ZHIXUE JINGDIAN MAKESIZHUYI ZHIXUE JUA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65.5

字数:750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6.00元(全二册)

策划编辑:饶涛 祁传华 责任编辑:曾忆梦 高玲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目 录

布洛赫	/	1	
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	/	3	
列菲伏尔	/	15	
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	/	17	
德波	/	59	
作为景观的商品与物化的意识形态	/	61	
马尔科维奇	/	77	
今天的辩证法	/	79	
彼得洛维奇	/	130	
革命的哲学概念	/	132	
赫勒	/	149	
从日常到类	/	151	
威廉斯	/	210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	212	

- 哈贝马斯 / 233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235
- 科恩 / 259
社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 261
- 詹姆逊 / 288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 290
- 鲍德里亚 / 330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 332
- 拉克劳 墨菲 / 365
超越社会的实证性：对抗与领导权 / 367
- 齐泽克 / 425
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兆 / 427
- 伊格尔顿 / 486
马克思主义的崇高 / 488
- 哈维 / 529
空间理论：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 / 531

布洛赫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 当代德国哲学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1885年, 布洛赫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路易港一个犹太人家庭, 13岁时写出《根据无神论看待世界万物》, 17岁时又写出《论力及其本质》; 1905年, 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心理学; 1907年, 在维尔茨堡攻读哲学、物理学、音乐; 1908—1911年, 在柏林大学结识了西美尔、卢卡奇、韦伯等人; 1933年, 流亡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 流亡美国; 1949—1957年, 任东德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 1961年移居西德, 受聘为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1977年, 在德国图宾根逝世。

布洛赫的主要著作有: 《关于李凯尔特和现代认识论问题的批判性讨论》(1909)、《乌托邦精神》(1918)、《主体—客体: 对黑格尔的解释》(1951)、《希望的原理》(1—3卷, 1954、1955和1959)、《天赋权利与人的尊严》(1961)、《哲学的基本问题: “尚未存在”本体论》(1961)、《图宾根哲学导论》(1963—1964)、《基督教中的无神论》

(1968)、《论马克思》(1971)、《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1972)等,其中,《希望的原理》和《论马克思》是代表作。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通过以希望为本体的哲学,建构一种与历史辩证法相联系的乌托邦精神,以使马克思主义这种面向未来的哲学重新焕发想象力和生命力。

“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选自《论马克思》,集中体现了布洛赫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述和批判。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只是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言才是合适的和可行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体现在,“精神的过程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实现了这一颠倒之后,辩证法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历史的主体不再是作为单纯的理智沉思承担者的主体,而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不是在观念的神圣领域内发生,而是在利益的社会领域发生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是与历史本身相等同的;经过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脚立地,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体现出一种反直观主义的动机,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化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这里继续存活着,在这种人道主义中,“整个世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启蒙的开放系统,它的核心是人,被客观地异化的人,以及处于不再被异化的事物中间的人”。

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

—

当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在 1836 年来到柏林的时候，黑格尔已经去世 5 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却依然在主导着每一个人，仿佛他还在那儿一样，他的目光好像在透过每个人的肩膀凝视远方，甚至包括他的敌人们。青年马克思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他本人已经被越来越紧地拴到黑格尔的身上了，尽管后者有着“非常怪异和不流畅的旋律”。在黑格尔左派的影响之下，然后主要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从精神走向了人。接着他又从观念走向了需要以及为满足需要而施展的各种社会计谋，从理智的运动走向了起源于经济利益的现实运动。但是如果马克思是以这种方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的，那么黑格尔也将表明他至少并不是对这些所谓的“原型”不熟悉。这

* 选自布洛赫：《论马克思》，纽约，1971。

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一不留神所讲出来的一句话在这里就是最恰当的例证——对于这句话，不仅是青年马克思，就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老年马克思也会强烈表示同意的。1807年，当黑格尔在班贝克以做编辑为生的时候，他在给他的一位在耶拿的朋友克奈贝尔少校(Major Knebel)的信中写道：“经验已使我确信圣经格言的真理，我已把它作为我的指导原则：先求肉和衣服，然后上帝之国就会自己加给你。”当然实际上马太福音说了刚好相反的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这句引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也可以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得到证实）那个富有成效的洞见，即为了使之具有革命性，黑格尔的思想并不总是需要太多的颠倒。

正是这个颠倒的过程，也是我们对于黑格尔所关注的最主要的事情，只有对于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来说才最适合和最可行。因为，在一个辩证法家的能力范围之内，他曾允许那些只有通过身体和现实的人而发生的过程来通过观念发生，他还经常让那些只发生在具体的存在关系中的事情被反映在观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他后来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通过把它改造为对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读”拯救了这种一般的辩证的合法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具体化了的辩证法控制着他的所有的分析，笼罩着他的所有的希望，这既体现在新的东西对包围着它的层层硬壳的突破中，也体现在对某种无论如何都会留存下来的超越的东西的保守上。正是这些，使得马克思与所有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们相反，他把苦难不仅仅看作苦难，而且看作是转折点。这种具体化了的辩证法使马克思确信无产阶级必须不仅仅被当作对人的否定，而且——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所承受的极端的非人化——它必须被视为“否定的否定”的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那种独特的解读消失了，黑格尔把辩证法仅仅解读为在宇宙对话中的来回谈话，也就是说，是世界设计师与他本人的对话。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这个虚假的精神主体。但是一旦它的唯心主义的假象退去，辩证法作为实在的过程就第一次变得真实可见了；它是运动中的物质的法则。马克思所抛弃掉的另外一种黑格尔主义就是那种对精神的理解，它把精神双倍精神化为回忆，而回忆在精神的辩证展开过程中最终不是取消了精神，而是正好相反，取消了经过、过程，或者——如马克思本人所说——取消了生产的空间，那就是时间。而真正的总体性和它的真正地普遍的基底现在则真实可见了——作为辩证的过程中的物质，它保留着开放性。这并没有把所谓最终的本质还原为某种过去的东西，或者是还原为某种实体，该实体从一开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完全“已然的”。因此，辩证的物质无论如何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变的类型。它并不构成那种只是带有一些辩证的修饰性的标语的“一大块”，这些标语极少能擦及它的表面，更不用说改造它了。

辩证物质的总体不存在于关于过去的视域中，像在黑格尔的回忆的精神中那样，或者像在机械的物质中那样——这一点自从德谟克利特以来就一直如此，而是存在于关于未来的视域中。辩证唯物主义现在视物质为朝着未来的方向而活动着的，过去本身也在对未来的参照中获得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把物质解读为所有的现象的前提，而且解读为某种尚未进入充分的现象存在的东西：它不仅许可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在可能性中存在。

因此，马克思会这样责备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像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儿子产生母亲，精神产生自然，基督宗教产生异教，结果产生开端。”但是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开端甚至不产生

结果；它的物质是没有结果的，而辩证的物质却有那为黑格尔所宣布的整个过程的生活在它前面。因此，辩证的一唯物主义的的知识已经连同它的所有的被僵化了的不安性和所有的不安的僵硬性一起废黜掉了黑格尔的逻各斯，但却占有了它的历史的领域。因此，对历史的自觉的生产和主动地把它和一个真正完全的总体（该总体尚未存在）相关联就产生了。

这就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转换：精神的过程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物质的逻辑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术语（例如，“异化”、“对象化”、“量到质的转换”等等）现在仍然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日程上。首先，由于辩证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仍然极其重要。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穷尽黑格尔的遗产的全部，因为，实际上，真正系统的黑格尔哲学的著作也以更加新和更加多样的形式包含了辩证法。恩格斯跟随着黑格尔的足迹写作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吸取了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同时也吸取了很多更加实质性的而不是纯粹“方法论的”内容。

另外，黑格尔的《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与这些社会关系相协调，这样就揭示了它们的具体意图，与此同时也背叛了它原本的企图，它原来打算根据“理念”来说明它们的重要性。还有，每当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工作延伸到文化时，他都会提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当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界定为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性的理论的直接继续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就是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因此，黑格尔的著作的延伸的部分——在这方面，至少在宗教哲学方面（黑格尔左派、费尔巴哈）——都属于马

克思主义的中介的历史——这当然还不是全部。即使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继续，它不仅对于黑格尔来说，而且对于所有以往的哲学来说，都是而且仍然是一种创新。原因在于，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不像在过去，哲学不是阶级社会的哲学，而是主张对阶级社会进行超越的哲学。然而，这一创新也不是一个突然的奇迹；相反，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这个中介，它就不会存在。

马克思说，人之不同于海狸就在于人计划着他的建筑。为了在他的活动中取得成功，他必须首先在头脑中考虑整件事情，并就其形成一些观念。但这却不是以我们经常在黑格尔那里所发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在他那儿，人从外部把一个概念或一种概念的公式化的运动带进事物之中。知识并不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头脑的深处，或仅仅来源于对它的沉思。它仅仅作为对真实的事件以及它们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范畴)的反映而产生。然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不看重事实：对他来说，它们仅仅是过程的环节或要素。根据这一过程的性质，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每一种知识都有它产生和适用的时代，哲学——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是它所处的时代(直接紧跟在之后的时代也包含在其中)在思想中的反映”。

在这里，马克思完全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但是却是以更加敏锐的方式，远远不是单纯的沉思。“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辩证的互动中，理解着的主体依赖历史的成熟性或依赖客体成熟到能够被理解的程度。在这里，作为单纯的理智沉思的承担者的主体绝非真正的历史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这二者相一致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产出思想的主体也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虽然这个沉思的主体，哲学的主体，到来得太晚。但是甚至这个后来的哲学家的意识，黑格尔把思想的主体还原为该意识，仍然基本上是历史—主体，除了他是事后的，他仅仅

有此荣誉而已。在黑格尔的宇宙硬币中，思想和存在，头和尾相一致，即使那个“头”只拥有一个领取养老金者的地位，因而仅仅记录世界的过程——而该过程恰恰是人们所以为的“头”。

另外，马克思在产出思想的主体身上则只看到一个虚假意识的承担者，他是在现实，即生产过程的外部，进行沉思的。否则，在另一个方面，只要思想融入到正在发生的现实之中，它本身作为变革的过程之中的一个要素，马克思也就承认思想的价值；也只有在此时，它才成为(无条件地)历史的生产者。作为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科学，它成为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力量，反过来对于生产和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它属于创造历史的主体，属于由意识所产生的历史。

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的主体绝对不是精神，而是人，是经济的和社会的人。这也不是那个同样抽象的人，像在费尔巴哈那里那样，人是一个单纯的类存在，而且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通过历史而变化着——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尚未被发现、尚未被解放的存在。

因此，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的过程，于其中一方总是纠正和改变着另一方，主要发生在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和之上，该基础——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上层建筑是相同的；它发生在利益的社会领域中，而不是在观念的神圣的领域中。马克思解读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就好像尽管黑格尔有一套唯心主义的学说，他已经提出了如此的唯物辩证法：《精神现象学》的“伟大成就”首先是“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接下来，最主要的，“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因此，绝对知识的自我产生已经让位于人通过工作的自我产生；精神的独立的自我发展(人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一个费力的过程)已经让位于真实的历史。它只以物质的辩证的形式存在,充满着阶级斗争,“人的解放”仅仅存在于终点——它尚未达到。

黑格尔以维吉尔的 *aeneid* 中的一句稍作变化了的引文来结束《哲学史讲演录》:“*Tantae molis erat, se ipsam cognoscere mentem*”;“认识自己的心灵是那样费力的事”。马克思则总是把这个负担解读为不仅仅是理智的,即使他和黑格尔一起都把德尔菲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尽管如此,他绝对无意把自我—知识仅仅界定为(和黑格尔左派一起)“自我意识的哲学”。自我知识成为非直观的,成为劳作着的人的自我知识,他在自我知识中既把自己看作商品,他是通过异化而成为商品的,也看作是一个创造价值的主体,他通过革命的行动而超越那强加在他身上的商品的性质。在马克思这里,这是对德尔菲神谕的实践贯彻——通过走向实践而超越异化。正是这异化使得生产的过程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对人的关系的知识都被尽可能地转化为天命,转化为物化的、不可认识的命运。

因此,辩证法必须学会不成为强加在事物之上的程序。即使是黑格尔本人也无意如此,因为他不赞成任何与内容相脱离的方法论;即使是在比较周围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中也不是这样。然而,黑格尔却把他的辩证法展开为纯粹唯心主义的,只要它涉及国家和人民,它总是根据一个先验的逻辑的标准来处理。

另外,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绝不是一种他据之以重新操纵历史的方法,而是与历史本身相等同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已经存在的集体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所导致的危机:所有这些在当代社会中所产生的矛盾都不是后来被方

法论地引进物质之中去的，都不是一种能够被轻易地改正的表面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它们属于关于其本质的辩证法。它是与社会的矛盾，已经发展至极端形式，正在迈向自身的消解——而不是在某种涉及现实的书中的某事，在书中精神可以得到满足，但与此同时，在那个被考察的国家中，一切却还依旧。一切旧的事物都将不再保持原状，相反，由于革命的辩证的知识的生产力，完全有可能达到更新的和更好的事物：这将由于关于物质本身的现实的辩证法而成为可能。它将由于这样一种物质条件而成为可能，在该条件之下，没有任何一块石头将保持原状，在该条件之下，通过认识着和行动着的人，这样的人是物质的最根本的形式，我们将有可能用可移动的石头建构起一座房屋或一个家园——简而言之，即建构起旧乌托邦主义者所说的“为人的世界”。

为了使得世界朝向这个方向前进，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和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世界必须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是的东西——一个物质的过程。所有的范畴和各种各样的领域（法律、艺术和科学）仅仅在现实之中发挥作用，该现实在历史中是被革命化了的。它们是这样一些存在的方式，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恒常的封闭的系统，而是相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领域”（法律、艺术和科学）从来就没有独立的生命或绝对的主权——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

关于自然也是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历史中介（中介的本质）：“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可以被划分为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但是这二者却不能被分离开来；只要人存在着，自然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就存在于相互决定的关系之中。”

在所有这些方面，最主要之点一直是，已经被以脚立地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再是直观的。在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处于主—客

关系之中的主体被规定为处于能动的活动中的，真正有生产力的。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这种反直观的动机既针对着旧的唯物主义，也针对着黑格尔。在他关于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德谟克利特忽略了“能动的原则”。与此完全一致，他因此责备费尔巴哈提出了一种仅仅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一种太过客观主义的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比在黑格尔那里要严重得多，对现实，仅仅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当然是在黑格尔那里，“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最终，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完全没有“主观的”或“加强的”因素，正如反黑格尔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和谢林从他们的“实证的”唯心主义的角度所猜测的那样。马克思在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中强调黑格尔辩证法中主—客关系的存在；他宣布，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是非常抽象的，但作为一种物质的力量不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仅仅存在于决定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由于他的劳动，也是这些关系的生产者和变革者。马克思认为世界不是一种机械的宇宙喧闹，在它之中除了外在的必然性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的意义，马克思使得一种历史的进化的人道主义存活着，这种人道主义来源于莱布尼茨，经由黑格尔而传给他。在他的人道主义中，整个世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启蒙的开放系统。它的核心是人，被客观地异化的人，以及处于不再被异化的事物中间的人。

这就是黑格尔在马克思中的生命。一种新型的社会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而不是那个在后黑格尔时代精神上已经衰退了的社会。

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把它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都是可以理解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理的而加以赞扬。”

“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是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的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统治者和国家的政治的、文学的和神学的行为。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想与感觉、灵魂与肉体、自身与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